

生态话语的刻意隐喻

王 柔

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7日

摘 要

本文立足生态话语与刻意隐喻的交叉视角, 以IPCC权威报告为语料, 引入生态语言学分析路径, 系统探讨刻意隐喻在重要生态话语中的深层运作逻辑。研究发现, IPCC报告通过“临界点”“机会之窗”“碳预算”“路径”等刻意隐喻, 编织出“危机逼近-时间紧迫-目标量化-路径可选”的技术治理叙事; 该叙事预设了以控制为导向的“控制-被控”关系模式; 从生态哲学观审视, 这一话语体系在提升治理可操作性的同时, 也存在简化生态复杂性、弱化公平正义议题等局限。本研究进一步指出, 上述隐喻策略在特定交际语境下具有策略合理性, 其简化性与动员效力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同时, 本研究尝试将“和谐共生”等替代性框架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话语策略建议。本研究推动了相关理论融合, 为生态话语隐喻分析提供了可操作路径。

关键词

生态话语, 刻意隐喻, 话语表征, 技术治理, 生态评估

A Study on the Deliberate Metaphors in Ecological Discourse

Rou W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Heilongjiang

Received: May 18, 2026; accepted: June 26, 2026; published: July 7, 2026

Abstract

From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and deliberate metaphor, this study takes authoritative IPCC reports as its corpus and introduces an ecolinguistic analytical pathway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deep operational logic of deliberate metaphors in key ecological discours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rough deliberate metaphors such as “tipping point”, “window of opportunity”, “carbon budget”, and “pathways”, the IPCC report weaves a techno-governance narrative of

文章引用: 王柔. 生态话语的刻意隐喻[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7): 49-56.

DOI: 10.12677/ml.2026.147617

“crisis approaching-time pressing-target quantified-pathways selectable”. This narrative presupposes a “control-oriented” relational model. Viewed through the lens of ecosophy, this discourse system, while enhancing the operability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also presents limitations such as simplifying ecological complexity and weakening issues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This study further argues that the strategic use of these metaphors carries context-specific rationality, and that their simplifying function must be understood in dialectical tension with their mobilizing power. It also attempts to translate alternative frameworks such as “harmonious coexistence” into concrete and actionable discursive strategies. This study advances the integration of relevant theories and provides an operable pathway for metaphor analysis in ecological discourse.

Keywords

Ecological Discourse, Deliberate Metaphor, Discursive Representation, Techno-Governance, Ecological Evalu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全球生态危机持续加剧、气候治理上升为国际政治核心议题的时代背景下，生态话语已成为兼具科学权威性、政策约束力与社会动员力的复合型实践。以 IPCC 报告为代表的重要生态话语，凭借全球顶尖科学家共同体的专业背书，成为各国制定气候政策、参与国际谈判、引导公众认知的核心依据，其影响力不仅源于气候科学数据的严谨性与共识性，更依赖一套精密、系统且极具策略性的修辞建构机制，能够将抽象、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科学结论，转化为清晰可感、富有情感张力、指向明确行动的公共叙事。

然而，既有生态话语隐喻研究多沿用传统概念隐喻理论，侧重对隐喻类型进行归纳分类或开展意识形态批判，将隐喻视为一种相对静态、集体无意识、深层固化的思维模式投射，普遍忽视隐喻使用的刻意性、策略性与意图性[1]。事实上，在 IPCC 报告这类高利害、目标导向极强的权威生态话语中，隐喻并非无意识的思维流露，而是话语主体为实现特定交际目标而精心设计、系统组合、反复强化的修辞武器，其选择、分布与功能均服务于明确的话语意图。

近年来，Steen 提出的刻意性隐喻理论为突破这一研究局限提供了关键理论支点[2]。该理论强调隐喻使用的有意识性与目标导向性，将研究焦点从“隐喻是什么”转向“隐喻如何被刻意使用”，为分析机构话语、政策话语、权威话语中的隐喻策略提供了全新视角[3]。基于此，本文将刻意性隐喻理论与生态话语分析系统结合，以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为实证语料，在揭示刻意隐喻修辞特征的基础上，引入生态语言学的分析路径，系统阐释刻意隐喻在生态话语中的深层运作逻辑及其生态影响，并揭示其背后的技术治理主义取向，以期深化生态话语隐喻研究，为气候传播与政策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2. 生态话语

生态话语是围绕生态问题、环境治理、气候危机、可持续发展等生态议题展开的所有语言实践，涵盖科学报告、政策文件、国际公约、媒体报道、公众言论、公益宣传等多种类型。由国际机构、国家政府、科学共同体等主体发布的具有科学支撑与政策导向的正式文本，IPCC 评估报告是其最典型代表。生态话语的核心特征体现为科学性与修辞性并存、客观性与倾向性交织、认知功能与行动功能统一，其根

本目的不仅是描述生态现实，更是建构生态认知、引导价值判断、推动社会行动[4]。生态话语分析是生态语言学的核心研究范式，以批判性视角解码生态话语的语言特征、建构机制与意识形态。与传统话语分析不同，生态话语分析始终坚守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强调揭示话语中隐含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模式，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消费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等不利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形态，倡导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5]。

在全球生态危机持续加剧、气候治理议程上升为国际政治核心议题的时代背景下，生态话语已不再是单纯的科学表述或信息传递，而是兼具科学权威性、政策约束力、社会动员力与意识形态导向性的复合型话语实践。以 IPCC 报告为代表的重要生态话语，凭借全球顶尖科学家共同体的背书，成为各国制定气候政策、参与国际谈判、引导公众认知的重要依据，其影响力远超一般学术文本与大众传播内容。这类话语之所以能够产生强大的社会效力，一方面源于气候科学数据的严谨性与共识性，另一方面则依赖于一套精密、系统且极具策略性的修辞建构机制，能够将抽象、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科学结论，转化为清晰可感、富有情感张力、指向明确行动的公共叙事，最终实现说服决策者、动员社会、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目标[6]。

生态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生态学、社会学与传播学交叉融合的新兴学科，始终将语言与生态的互动关系、话语对生态现实的建构作用作为核心研究对象[4]。隐喻作为生态话语中最核心、最普遍的修辞与认知工具，长期以来是生态话语分析的重点议题。然而，既有研究大多沿用 Lakoff & Johnson 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路径，侧重对隐喻类型进行归纳分类，或批判隐喻所折射的意识形态，将隐喻视为一种相对静态、集体无意识、深层固化的思维模式投射[1]。这种研究范式虽能揭示隐喻的认知基础与价值倾向，但难以解释权威生态话语中隐喻的策略性、意图性、动态性特征——在 IPCC 报告这类高利害、目标导向极强的机构话语中，隐喻并非无意识的思维流露，而是话语主体为实现特定交际意图而刻意选择、精心设计、系统组合的修辞武器。

近年来，Steen 提出的刻意性隐喻理论为突破这一研究局限提供了关键理论支点[2]。该理论明确区分了隐喻使用的刻意性与非刻意性，强调刻意性隐喻是说话者有意识、有目的地引导受众通过源域视角理解目标域，以实现特定修辞效果与交际意图的语言行为。刻意性隐喻理论将研究焦点从“隐喻是什么”转向“隐喻如何被刻意使用”，从静态认知结构转向动态交际实践，为分析机构话语、政策话语、传播话语中的隐喻策略提供了全新视角[3]。将刻意性隐喻理论系统引入生态话语分析，能够有效弥补传统概念隐喻研究的不足，帮助学界更精准地揭示权威生态话语中隐喻的运作机制、功能效应与意识形态本质[7]。

在生态话语实践中，隐喻的使用并非随意而为，而是围绕特定交际目标展开的系统性选择。以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决策者摘要》(IPCC AR6 Synthesis Report: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为例，报告面向政策制定者，核心意图是传递气候风险、强调行动紧迫性、提供可行方案并推动全球减排行动，其隐喻选择均围绕这一核心意图展开，具有高度的意图性与策略性。报告中频繁出现的“机会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碳预算(carbon budget)”“临界点(tipping point)”“路径(pathways)”等隐喻，均经过科学共同体的审慎选择，具有明确的修辞目标与语境显著性，属于典型的刻意性隐喻[8]。这些隐喻不仅是语言表达的装饰，更是承担风险建构、责任分配、行动召唤的核心工具，深刻影响着受众对生态问题的理解与应对方式。赵蕊华、黄国文建构的和谐话语分析框架为理解此类话语的生态取向提供了方法论支撑[9]，邹春玲则从生态转喻视角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和谐话语的建构路径[10]。

为进一步将本文论点置于更广阔的学术脉络中，有必要回顾近年来围绕 IPCC 话语、气候传播隐喻及气候正义的相关研究。例如，有研究对 IPCC 报告视觉隐喻的分析揭示了图像与文字隐喻在风险感知中的协同作用[11]；另有研究从语用学角度探讨了 IPCC 报告中的责任归因策略[12]；还有研究系统比较了

不同国家媒体对“碳预算”隐喻的接受与重构[13]。在气候正义话语方面,关于历史责任与减排负担分配的讨论[14],以及对气候治理中正义维度的批判性分析[15],均为理解“碳预算”隐喻的伦理意涵提供了重要参照。本文将在讨论“碳预算”与“技术治理”等关键概念时,与上述文献进行更直接的互动。

3. 刻意隐喻

刻意性隐喻理论由 Steen 系统提出,是认知语言学从认知研究转向交际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2]。该理论突破了传统概念隐喻理论“隐喻是无意识思维”的核心论断,明确将隐喻使用分为刻意性隐喻与非刻意性隐喻两大类型,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说话者的意图性与受众的注意导向。刻意性隐喻的核心判定标准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意图性,说话者有意识地选择隐喻,而非无意识地使用固化概念映射;二是注意导向,说话者刻意引导受众将注意力从目标域转向源域,通过源域的特征理解目标域;三是临时性,隐喻使用具有明确的语境目标与修辞效果,服务于特定交际意图[3]。简言之,刻意性隐喻是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主动使用的隐喻,是一种“有意识的修辞-认知装置”,而非“无意识的思维习惯”。

与传统概念隐喻不同,刻意隐喻具有鲜明的目标导向性与策略性。在政策话语、科学话语、机构话语等正式文本中,刻意隐喻尤为常见。这类话语通常目标明确、立场鲜明、受众清晰,需要通过强有力的修辞手段简化复杂问题、强化叙事逻辑、统一认知框架,进而实现说服、动员与引导的目标[16]。隐喻因其具象化、结构化、情感化的表达优势,能够将抽象、陌生、难以理解的目标域概念,转化为具体、熟悉、易感知的源域概念,降低受众的认知难度,提升信息的传播效率与接受意愿[1]。而刻意隐喻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其目的性与策略性,成为话语主体实现特定交际目标的核心工具。

在生态话语,尤其是气候治理话语中,刻意隐喻的作用更为关键。气候问题具有全球性、长期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涉及科学、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若仅依靠纯数据的罗列与公式化的表述,难以进入公共话语体系并形成广泛的行动共识。因此,科学共同体与政策制定者往往需要刻意选择、设计并重复使用一系列隐喻,将复杂的气候危机转化为公众可理解、可感知、可应对的现实议题[8]。这些隐喻并非随机出现,而是高度策略化的刻意修辞,其选择、分布、使用方式均服务于特定的话语目标,如强化风险认知、凸显行动紧迫性、设定治理边界、引导行动方向等。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决策者摘要》(IPCC AR6 Synthesis Report)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文本,其隐喻系统集中展现了刻意隐喻在生态话语中的应用特征。报告中的“临界点(tipping point)”隐喻以物体倾斜的临界支点为源域,将气候系统不可逆突变的阈值视为关键风险节点。报告明确指出,若升温超过 1.5°C,将可能触发多重气候临界点(“could trigger multiple climate tipping points”),带来危险且不可逆的影响,刻意强化危机叙事,凸显规避风险的必要性。“机会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隐喻以可关闭的物理窗口为源域,将气候行动的有效时间视为稀缺且不可逆的资源。IPCC 报告明确警告存在一扇“正在快速关闭的机会之窗”(“a rapidly closing window of opportunity to secure a liveable and sustainable future for all”),刻意引导受众感知时间的紧迫性。“碳预算(carbon budget)”隐喻以财政预算为源域,将全球可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转化为可核算、可分配、需严控的有限资源,刻意引导受众用财务管理的逻辑看待碳排放问题,将生态议题转化为资源管理议题[8]。“路径(pathways)”隐喻以可选择的道路为源域,将实现净零排放的政策方案与发展模式视为可规划、可优化、可控制的行动路径,刻意引导受众将气候治理视为一项可系统设计、稳步推进的工程。报告在 SPM.6 图中系统呈现了多条“发展路径”(“illustrative development pathways”),展示不同政策和行动选择将导向截然不同的气候结果。

这些隐喻均符合刻意性隐喻的核心判定标准,具有明确的意图性、清晰的注意导向性与显著的语境显著性,是话语主体为实现气候风险传递、行动动员与政策引导而刻意使用的核心修辞工具。与传统无

意识隐喻不同，它们不仅是思维方式的体现，更是话语策略的产物，深刻反映了生态话语中隐喻使用的刻意性与策略性特征[3]。然而，仅从修辞策略或功能罗列的角度分析这些刻意隐喻，仍难以揭示其背后的深层关系逻辑与生态价值取向。生态语言学强调，话语分析的根本任务不是罗列功能，而是揭示话语如何建构现实、预设关系，并对这种建构进行生态价值评判[5]。因此，下文将遵循生态语言学的分析路径，从表征建构、关系模式与价值评判三个层面，系统阐释刻意隐喻在生态话语中的深层运作逻辑及其生态影响。

4. IPCC 报告刻意隐喻的识别与功能分析

4.1. 隐喻识别与刻意性验证

IPCC AR6 决策者摘要中频繁出现“临界点(tipping point)”“机会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碳预算(carbon budget)”“路径(pathways)”等表达。以下逐一验证其刻意性。

(1) “机会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

报告明确指出存在“一扇正在快速关闭的机会之窗(a rapidly closing window of opportunity to secure a liveable and sustainable future for all)”。该隐喻完全符合刻意性三标准：① 意图性——并非无意识使用“窗口”一词，而是为将抽象的时间紧迫性转化为具象的空间体验，服务于“动员立即行动”的明确实际意图；② 注意导向——该表达在“决策者摘要”这一高度精炼的文本中占据显著位置，刻意引导读者从“窗口的开合”理解行动机会的时限；③ 语境显著性——在讨论“未来是否宜居”这一高风险议题时，“窗口”作为不寻常的源域选择，必然引起读者注意与跨域映射。

(2) “碳预算(carbon budget)”

该隐喻以财政预算为源域，将全球可排放温室气体总量转化为可核算、可分配的有限资源。其刻意性体现在：选择“预算”而非“债务”或“遗产”等替代隐喻，旨在以面向未来的合作框架取代历史责任的追责难题，从而降低国际谈判的政治敏感性[17]。这一策略选择本身具有交际合理性，但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公平分配与历史责任的持续学术辩论[15]。

(3) “临界点(tipping point)”

以力学失衡为源域，将气候系统不可逆突变的阈值视为关键风险节点。报告指出升温超过 1.5°C 将“触发多重气候临界点(trigger multiple climate tipping points)”。该隐喻刻意强化危机叙事，凸显规避风险的紧迫性。

(4) “路径(pathways)”

以可选择道路为源域，将实现净零排放的政策方案视为可规划的行动路径。报告在 SPM.6 图中系统呈现多条“发展路径(development pathways)”，刻意引导读者将气候治理视为可模拟、可优化的系统工程。

4.2. 技术治理叙事体系的建构

上述刻意隐喻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编织出一个“危机逼近 - 时间紧迫 - 目标量化 - 路径可选”的完整叙事[8]。“临界点”奠定危机基调，“机会之窗”将紧迫性时间化与具象化，“碳预算”设定量化目标与约束边界，“路径”提供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从生态语言学视角看，这种表征并非中性描述，而是有意识地选择与简化现实：它将非线性的地球系统、充满价值冲突的国际博弈，表征为一个可通过科学计算与技术规划来解决的线性工程问题。这种“技术治理叙事”是 IPCC 报告实现其科学-政策桥梁功能的关键机制，但其简化性也潜藏着将复杂生态问题窄化为技术问题的风险[5]。

5. 刻意隐喻的生态价值评估

5.1. 以“控制”为导向的关系模式

这套刻意隐喻体系强化了以控制为导向的生态观。“碳预算”将地球生态系统框定为“资源库”或“预算账户”；“路径”将自然与社会的未来想象为可按人类蓝图规划的工程。在这些隐喻框架下，自然被客体化为被动的、可被人类管理和操控的对象，人类则居于主动的中心管理者地位。自然的复杂性、主体性和内在价值被隐去，其意义主要在于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和承受风险[4]。这与生态语言学倡导的“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理念存在明显张力[7]。

同时，隐喻体系预设了一种“控制-被控”的二元对立关系。“临界点”与“机会之窗”共同建构了“失控的风险”与“控制的紧迫”之间的张力，暗示人类必须对自然进行干预与管控才能避免崩溃。这背后是“人类作为控制者，自然作为被控对象”的深层思维框架。何伟、魏榕指出，这种思维框架本质上是一种非和谐的关系预设，忽视了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性[7]。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批判不应走向简单否定。技术治理叙事及其隐喻策略在特定交际语境中具有明确的策略合理性：IPCC 报告的首要受众是全球政策制定者，其核心使命是在有限篇幅内传递紧急信息并推动共识形成。在此约束下，简化复杂性、突出可量化指标、提供可选路径，是一种务实的修辞选择。事实上，若无“碳预算”“路径”等隐喻，跨国的气候谈判将因概念过于抽象而难以推进。因此，辩证地看，这种话语的简化性恰恰是其动员效力的前提条件。

5.2. 技术治理话语的意识形态批判

从生态价值评估角度看，这套话语体系具有内在的双重效应。其有益性在于提升生态治理的可操作性与全球共识度。通过刻意隐喻，IPCC 报告将难以理解的气候科学转化为决策者与公众可感知、可讨论的议题，为跨国谈判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明确的话语框架[8]。任何推动全球减排的实际行动，客观上都具有保护生态系统的积极意义。

但其潜在的破坏性也不容忽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简化生态复杂性，遮蔽系统性矛盾。技术治理叙事将气候危机简化为以“碳”为核心的可管理变量，可能导致解决方案过度聚焦能源技术和碳排放核算，而忽视消费主义、经济增长模式、社会公平、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同样根本性的驱动因素[5]；第二，弱化公平与正义议题。刻意选择“碳预算”而非“碳债务”隐喻，本身就是一种话语策略。例如，“债务”类隐喻会直接指向历史责任和赔偿，政治敏感性极高；而“预算”隐喻则面向未来，强调共同规划，巧妙地规避了发达国家历史累积排放的责任归属[17]。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这种选择虽有助于达成协议，但也使得历史排放的“气候债务”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在技术中性的治理语言中被稀释。第三，挤压多元知识与行动路径。技术治理话语推崇专家系统和数学模型，容易在话语层面边缘化基于社区的本土生态知识、草根环保运动以及注重文化和社会转型的解决方案，使得应对气候危机的智慧来源和行动路径变得单一化[18]。

针对上述局限，本文尝试初步构想“和谐共生”等替代性话语框架如何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话语策略。首先，“和谐共生”框架可以借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出一组新的刻意隐喻，例如将地球系统隐喻为“生命共同体”，其中各要素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而非可单独控制的账户或机器。其次，这一框架可转化为可操作的叙事结构：在政策文本中，可并置“碳预算”与“生态承载边界”两种隐喻，前者用于量化管理，后者用于提醒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非线性的反馈机制。再次，在修辞策略上，可借鉴“责任共担”的隐喻，将气候行动重新框定为基于共同生存利益的合作，而非单纯的资源管控。这些策略并非要完全取代技术治理隐喻，而是对其进行补充和制衡，使生态话语在保持动员效力的同时，

容纳更多的伦理维度与复杂性。

综上, IPCC 报告通过刻意隐喻所构建的话语体系, 是一种具有内在张力的“技术治理主义”生态话语。它服务于快速凝聚共识、推动政策行动的目标, 但其内在的控制导向和对复杂性的简化, 也使话语在与多元生态价值观对话时显示出不足。未来生态话语建构, 或许需要在利用技术治理有效性的同时, 有意识地引入能够体现“和谐共生”“多元共存”“责任共担”等生态伦理的新的隐喻框架。

6. 结语

本研究以生态话语为分析对象, 对其中刻意隐喻的表征与认知功能进行了系统考察, 并遵循生态语言学的分析路径, 从表征建构、关系预设与生态评估三个维度揭示了刻意隐喻在重要生态话语中的深层运作逻辑。研究表明, IPCC 报告通过“临界点”“机会之窗”“碳预算”“路径”等刻意隐喻, 编织出“危机逼近-时间紧迫-目标量化-路径可选”的技术治理叙事体系; 该叙事预设了以控制为导向的关系模式, 将自然客体化为可管理的被动对象; 从生态哲学观审视, 这一话语体系在提升生态治理可操作性与全球共识度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但其简化生态复杂性、弱化公平正义议题、挤压多元知识路径的局限也不容忽视。本研究进一步指出, 上述隐喻策略在特定交际语境下具有策略合理性, 其简化性与动员效力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同时, 研究尝试将“和谐共生”等替代性框架转化为具体的话语操作建议, 以增强其建设性。

从理论层面看, 本研究推动了刻意隐喻理论与生态话语分析的系统融合, 为生态话语隐喻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从实践层面看, 研究揭示出权威生态话语背后技术治理主义的双重效应, 提示未来生态话语建构需在利用技术治理有效性的同时, 有意识地引入体现和谐共生、责任共担等生态伦理的新型隐喻框架。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多模态生态话语中的刻意隐喻实践, 拓展不同语境下生态隐喻的功能差异, 从而为生态话语的建构与优化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Steen, G.J. (2017) 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 Basic Assumptions, Main Tenets, Urgent Issues.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14, 1-24. <https://doi.org/10.1515/ip-2017-0001>
- [3] 范振强. 基于交际维度的刻意性隐喻理论: 问题与展望[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1(2): 1-10.
- [4] 黄国文. 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J]. 中国外语, 2016, 13(1): 9-12.
- [5] 黄国文, 赵蕊华. 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J]. 现代外语, 2017, 40(5): 585-596.
- [6] 高云, 罗勇, 张军岩. 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看气候变化谈判的焦点问题及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的可能作用[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10, 6(2): 83-88.
- [7] 何伟, 魏榕. 多元和谐, 交互共生——国际生态话语分析之生态哲学观建构[J]. 外语学刊, 2018(6): 28-35.
- [8] 汪少华, 李颜希. 中国气候话语架构的动态演变之道[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5(3): 11-21.
- [9] 赵蕊华, 黄国文. 和谐话语分析框架及其应用[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 53(1): 42-53.
- [10] 邹春玲. 中国和谐话语的生态转喻模式[J]. 外语教育研究, 2021, 9(1): 10-16.
- [11] Caney, S. (2010) Climate Change and the Duties of the Advantaged.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13, 203-228. <https://doi.org/10.1080/13698230903326331>
- [12] Fløttum, K. (2019) The Linguistic Construal of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in IPCC Reports. *Text & Talk*, 39, 587-606.
- [13] Schmid-Petri, H., Adam, S. and Reber, U. (2017) The Use of Metaphors in German Climate Discourse.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11, 746-761.
- [14] O'Neill, S.J., Smith, N., Boykoff, M., et al. (2015) Visual Portrayals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IPCC AR5. *Nature Climate Change*, 5, 607-612.
- [15] Okereke, C. (2008) Equity Norm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8, 25-50.

<https://doi.org/10.1162/glep.2008.8.3.25>

- [16] 辛斌. 批评语篇分析的社会和认知取向[J]. 外语研究, 2007(6): 19-24.
- [17] 杜永欣, 陈汝东. 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中的概念隐喻功能研究[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0(2): 75-82.
- [18] Stibbe, A. 生态语言学: 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M]. 陈咏, 黄国文, 吴学进,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